

§ 專題論文 §

邊疆的「內地化」—— 以清代會理地區的金江書院建設為例

鄭 豪 *

會理位於四川南端，地處「華夏邊緣」。清代官僚士人不僅參與創建書院、主持書院教育、扶持書院經濟，更利用方志書寫強化政治與文化的歷史記憶，塑造當地的夷夏觀念與文化認同。咸豐年間的社會動亂，促使地方菁英將漢人集體受難的經驗轉化為凝聚族群認同的工具，這些集體記憶被刻畫在方志之中，經過當地士人的宣講，成為維護儒家正統、構建「大一統」歷史觀的重要資源。會理地區歷經改土歸流與書院建設，重塑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最終趨於「內地化」。金江書院歷史之升沉起伏，恰可作為觀察清代國家建設與特質轉變的重要個案。

關鍵詞：清代會理 金江書院 華夏邊緣 內地化 方志書寫
「大一統」歷史觀

收 稿：2021.10.03；通過刊登：2022.04.05

* 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候選人；Email: zhenghao93@163.com.

前 言

- 一、官僚士人：推動書院建設的中堅力量
 - 二、淡化夷夏：書院建設與「大一統」歷史觀
 - 三、社會動亂：重塑政治與文化的歷史記憶
- 結 語

前 言

會理（今四川會理）本為古南方絲綢之路上的重鎮，北鄰涼山蠻（涼山彝族聚居區），南面雲南，西近藏區，東接羅僕，地處川滇要衝，地理位置頗為重要。有清一代，當地士人曾在會理地區建置金江書院，利用這種獨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從過去的社會歷史記憶中選材，在新的認同體系與時代背景下，利用書寫方志，不斷塑造新的歷史記憶，推動這一地區的「內地化」。儘管清廷及地方士人開展書院建設、推動「內地化」的效果並不盡如人意，但餘波所及，卻對今日會理地區的文化面貌產生深遠影響。

學界有關古代書院的研究，成果十分豐碩。肖永明、劉艷偉對 1949 年以來中國的書院史研究做了系統性的梳理與反思。¹黃麗生以臺灣書院和內蒙古書院作比較，討論邊區書院發展的特性。²此外，地方書院的發展與方志纂修往往存在密切關係，曾偉和張繼瑩以個案研究的方式，討論明清易代之際方志編纂與

1 肖永明、劉艷偉，〈新中國成立以來書院研究的梳理與反思〉，《大學教育科學》2020 年第 3 期（長沙），頁 88-95。

2 黃麗生，〈清代邊區儒學的發展與特質：臺灣書院與內蒙古書院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 年 12 月，臺北），頁 97-136。

地方社會、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寫的議題。³王明珂則藉由清代雲南王崧（1752-1838）所撰方志，探索當時的士人世界與政治社會情境。⁴本文選取金江書院這一個案，將之置於清朝國家建設的體系之中，嘗試分析會理地區書院建制的特殊背景，展現清廷和當地士人透過書院建設以及方志書寫，企圖逐漸淡化夷夏之防、促進邊疆「內地化」的歷史過程。

不同於以往從地理位置定義的「邊疆」概念，本文所謂「邊疆」（frontier）既非邊界線，也非邊境地區，而是漢文明與非漢文明間的交錯地帶。⁵會理地區鄰近雲南，長期為雲南地區政權統治。長年以來，雲南作為獨立區域，游離於中華帝國的政治控制之外，直到 14 世紀後才正式被蒙古帝國征服，納入中華帝國的行政區劃之中。討論會理地區的「內地化」，是以微觀史案例，窺探中華帝國作為外來者，如何將當地原住民融入帝國秩序，進而藉助科舉制度與儒家文化，催生出統一王朝臣民身份與文化認同的過程。在此，「邊疆」實際上是指一種外向的行軍線（outward-oriented march line），中央政府領土控制的大小與範圍，受制於邊界地區（border area）。「邊疆」也

3 曾偉，〈明清易代之際的方志編纂與地方社會——以渾源州為例〉，《中國地方志》2018年第2期（北京），頁44-55；張繼瑩，〈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寫——以清代大同方志為例〉，《清華學報》第50卷第2期（2020年6月，新竹），頁275-311。

4 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時期雲南方志的本文與情境〉，收入孫江主編，《新史學（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97-118。

5 田耕將川邊、滇藏、甘肅等地稱為清朝外邊疆與內省之間的「內邊疆」，著重關注清朝國家建設中關聯內地與內邊疆的省制問題，考察內邊疆對歷史社會學的理論意義。關於此點，參看「『邊疆：流動的歷史空間』會議綜述」，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微信公眾號，2022年1月19日，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aKnhINha5MMnH4I-zxqIXg>（檢索日期：2022年1月25日）。

是潛在擴張與文化推進的地區，政權傾向於以此為基礎佔據整個前線地帶（whole belt in front）。「邊疆」的概念與「邊界」（boundary）不同，後者是指一種內向的「界限」（inward-looking “bound”），是現代國家在排外的管轄權下，合併領土的一條明確的分界線（a sharp dividing line）。⁶也即，「邊疆」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地帶性和變易性。⁷

表一所示會理地區行政建置的變化，清楚表現出該地所具有的區位特點：「東連烏蒙，西距吐蕃，南接中慶，北鄰西蜀。地據西南咽喉衝要之處，山清水秀，田地膏腴，悍蔽三川，咽喉六詔。」⁸會理地處安寧河谷地一帶，光照充足，氣候溫和，適宜農業發展。⁹在傳統史書撰述者眼中，此地自秦漢設

6 George Curzon, *Fronti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8); L. K. D. Kristof, “The Nature of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9, no. 3 (1959, Philadelphia), pp. 269-271; Alastair Lamb,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14-15; Friedrich Kratochwil, “Of Systems, Boundaries, and Territori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System,” *World Politics* 39, no. 1 (1986, Cambridge), pp. 27-52.

7 李鴻賓，〈唐朝北部疆域的變遷——兼論疆域問題的本質與屬性〉，《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4卷第2期（2014年6月，北京），頁63-76；李鴻賓，〈有關唐朝疆域問題的若干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44卷第1期（2017年1月，北京），頁99-106。

8 和珅等纂，穆彰阿等修，《嘉慶重修一統志》（北京：中華書局，1986據1936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重印），卷400，〈寧遠府一·形勢〉，頁20110。

9 會理本是山間斷陷盆地（雲南稱為「壩子」），面積較為寬廣，又位於大小涼山區域第三階梯之上，緩坡、平壩、河谷地和湖盆眾多，盆地內部地勢平坦，土壤條件相對較好，水資源豐富，可實行輪作複種制。全年日照時數遠高於同緯度的黔、湘、贛、浙南、閩北等地，光熱資源充足，適宜發展河谷壩區農業耕作，遂成為漢人移民定居的重要區域。關於自然環境的敘述，可參看會理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會理縣志》（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頁81-97。

郡縣以來，便一直是中原政權力圖控制並藉以掣肘西南的重要據點。朝廷與地方勢力之間的博弈在此地反覆上演，雙方的邊界也常隨政治勢力的消長與行政建置的變遷而改易。清代朝廷在此地設立州縣，主要仍著眼其軍事意義，凸顯此地軍事戰略的重要地位和價值。

表一 會理地區行政建置歷史簡表

朝代變遷	建制變革
秦	屬蜀郡，設縣
漢初	為邛都國
西漢至南朝宋	設縣
南朝齊至唐貞觀七年（633）	「沒於蠻獠」，縣廢治
唐貞觀八年至天寶十四載（755）	設縣
唐至德元載（756）至大理時期	為南詔所據，設都督府
元	置府設州
明	設守禦千戶所、衛軍民指揮使司
清	改制為州

資料來源：本表主要據楊昶等修，王繼曾等纂，《四川省會理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據同治九年〔1871〕¹⁰刊本影印，以下簡稱《（同治）會理州志》），卷 1，〈封域志·會理州建置沿革表〉，頁 117；《嘉慶重修一統志》，卷 400，〈寧遠府一·建置沿革·會理州〉，頁 20101-20109。

10 《會理州志》封面署「同治九年歲在庚午冬刊」，鄧仁垣〈重修會理州志序〉說「次年冬月書成」，吳鍾倫序也寫於「庚午仲冬月」，「冬月」、「仲冬」均指農曆十一月，故書成刊行之時應是十二月，折算為西曆 1871 年。

質言之，作為典型的「華夏邊緣」地帶，¹¹會理是中原朝廷與西南地方勢力博弈的重要場所。方志稱此地居民「漢蠻雜處，蠻類百種，披氊赤足，飲食蟲鼠，出帶弓弩，天性悍戾」，¹²可以說是傳統方志書寫中典型的異族意象表現。特殊的地質構造，使得該地形成多金屬富集礦床帶，早在戰國時期已開始冶煉青銅，清中葉達到繁盛。¹³附近的鹽源出產食鹽，享有「鹽鐵之利」。¹⁴作為大涼山核心腹地的外圍，會理並不像涼山腹地那樣幽閉，反而是不同族群進行商品交易、移民混居、利益爭奪、文化角力的緩衝之處，社會風俗因而呈現出雜糅漢蠻、交錯共存的特點。此種地理、社會條件既便於中原勢力在此地的拓展與深入，也使得多個族群與勢力在此交匯、磨合甚至衝突。由是之故，清廷在當地進行改土歸流與建置州縣之後，如何在強化軍事、政治統治的基礎上開展文化建設，改變當地的文化面貌以統合於清朝的國家建設，便成為擺在朝廷面前的一道難題。

11 關於「華夏邊緣」的概念與討論，參看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頁9-10。

12 《嘉慶重修一統志》，卷400，〈寧遠府一·風俗〉，頁20110。

13 唐翔，〈會理城河流域的古代文化遺存〉，《四川文物》1992年第4期（成都），頁14-18；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會理縣文物管理所、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會理縣渾水塘煉銅遺址調查簡報〉，收入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等編，《安寧河流域古文化調查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291-296；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會理縣文物管理所，〈會理縣渾水塘冶煉遺址2017年調查報告〉，收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17）》（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415-422。

14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四川鹽源縣古代鹽業與文化的考古調查〉，收入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等編，《安寧河流域古文化調查與研究》，頁279-290。

一、官僚士人：推動書院建設的中堅力量

《（同治）會理州志》記載，清乾隆十六年（1751），知州韓摺籌資，於會理城西南一隅（今人民武裝部後）建講堂三間，名「會華書院」，始為義學。此為金江書院建置之始。此後書院建制累經變更，其名稱亦有變化，最後定名為「金江書院」並沿用至今（故本文統稱為「金江書院」，參看表二）。

表二 清代金江書院大事年表

年份	主要事件
乾隆十六年（1751）	知州韓摺建會華書院，位於城內西南隅（今人民武裝部後）。
乾隆十八年（1753）	知州蔣文祚擴建，改稱「玉墟書院」。
乾隆五十九年（1794）	知州曾濟哲擴建，改稱「會川書院」。
嘉慶十六年（1811）	知州德勳以義學為學署，將書院遷建於文廟之東南側（今民政局家屬院）。
道光元年（1821）	知州劉德銓將書院遷址，更名為「金江書院」。
咸豐十年（1860）	雲南回民叛亂，攻佔會理，書院被毀。
咸豐十一年（1861）	回民之事平，知州王燕瓊將書院遷至回民清真寺（今會理一中）。
光緒二十九年（1903）	知州胡雨餘改書院為「會理州中區高等小學堂」。
光緒三十二年（1906）	改制後的會理州中區高等小學堂正式開堂，實行學監制，康受嘉任首任校長。

資料來源：李勇主編，《四川省會理第一中學校志（1751-2010）》

（涼山：四川省會理第一中學編印，2011），頁4-5。

金江書院創制之始，雖名為書院，實為義學。「書院以育天下之英俊，義學以養天下之童蒙。二者皆推廣學校之意，而

義學之所暨尤廣。」¹⁵在古代，書院相當於現今的成人教育，而義學（包括社學）則相當於小學教育。金江書院發軔之時，其功用僅限於童蒙初學。

當地官僚士人對於金江書院的發展貢獻甚大，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參與書院創建。金江書院的創建及發展，先後有知州韓搢、穆元章、蔣文祚、曾濬哲、德勳、劉德銓、王錫之、王燕瓊、鄧仁垣等出面領銜，率領士民不斷擴大書院的建設規模。特別是知州劉德銓在任期間，書院得以修繕擴充，並正式更名為「金江書院」，建置大體完備。¹⁶

第二，主持書院教育。一如史上眾多書院，金江書院實行以山長（又稱「掌院」）為首的負責制。山長由地方官府在本地舉人或進士中選聘，待遇優厚。有清一代，萬松筠、廖坤培（1816-1894）、吳曉峰等人曾擔任金江書院山長職務。其中廖坤培於同治元年（1862）參加會試，中壬戌科第 42 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任翰林院編修、貴州學政使等職。後因母喪辭官回鄉，在金江書院主講。這些經由科舉考試成為地方菁英的官僚士人主持書院教育，有助於發揮書院的教化功能，從而擴大朝廷在當地的影響力。

第三，扶持書院經濟。金江書院的經費來源，主要有官府籌資、士民捐贈以及將具有產權爭議的田地劃歸書院所有等方式。金江書院主要的資金得自當地官紳士庶捐助，並以此購置

15 林丹雲，〈開縣新設義學記〉，收入恩成修，劉德銓纂，《（道光）夔州府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 50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據道光七年〔1827〕刻本影印），卷 36，〈藝文志〉，頁 831。

16 《（同治）會理州志》，卷 2，〈營建志·書院〉，頁 216。

田地、房屋、山林、碾房等學產，收租取息為日常開支。不足之數，方由州府自地方捐稅撥補。學田是書院建設發展必不可少的經濟基礎，知州蔣文祚曾捐置學田、裕膏火。《（同治）會理州志》記載，金江書院自乾隆年間開始購置學田，後逐年增加。據不完全統計，至《（同治）會理州志》刊行的同治九年冬（1871），已有田 30 餘處，至少價值白銀 17,600 多兩。¹⁷地方士人對書院建設的熱衷以及大量經費的投入，使金江書院成為寧遠府及其所屬各州書院首富，進一步凸顯該書院的特殊地位和價值。

官僚士人參與書院創建、主持書院教育、扶持書院經濟，使得書院規模大為擴張，並走向正規化。金江書院的建設雖由清廷主導，但發展過程亦吸納當地士人的力量。由地方菁英執筆纂修的州志，亦明顯反映出他們的利益訴求與觀念。曾濬哲在〈會理州志序〉指出「此地為川南門戶，素稱隘邑」，故而「以邊圉為重，撫綏漢夷為要」，並宣示自己有「守土之責」。¹⁸嚴爾諱〈續修會理州志序〉亦指出方志之纂修「第非守土者，弗克勝任」。¹⁹參與書院建設的官僚士人重視自身與「守

17 《（同治）會理州志》，卷 2，〈營建志·書院膏火田〉、〈營建志·書院賓興田〉，頁 237-245。需要說明的是，方志對膏火田、賓興田的記載不完備且多有含混，部分土地（約三分之一）面積只寫「一莊」、「一處」，有些土地未折合銀價，大部分土地都未註明收租幾何。故此處統計只是大略而言，實際數量當超過此數。若按方志所載，書院年收成不過 35 石，學田面積折合 16.3 畝。以每畝產 2 石糧食（南方為稻米）計算，一年當有 32.6 石。加上未言明耕地面積的產量，實際數量當不止此數。此處所引四川稻米畝產量，係依據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頁 275-276。

18 曾濬哲，〈會理州志序〉，《（同治）會理州志》，卷首，頁 17-18。

19 嚴爾諱，〈續修會理州志序〉，《（同治）會理州志》，卷首，頁 23。

土之責」的關係，足見其認定金江書院的設立，是清廷在會理此一特殊地區施行道德教化與撫慰邊地的重要方式。官僚士人透過方志將會理視為帝國的一部分，方志的撰述與社會情境結構形成對應關係。²⁰這一系列舉動的背後，都指向清廷力圖重塑和構建的「大一統」歷史觀。

二、淡化夷夏：書院建設與「大一統」歷史觀

明朝曾在會理設立衛所制度。「洪武（1368-1398）初或罷廢邊境州縣，即以州縣之任責諸都司衛所；後復循此例，置都司衛所於未嘗設州縣之地，於是此種都司衛所遂兼理軍民政，而成為地方區劃矣。」²¹洪武十七年（1384），明廷正式設立會川衛指揮使司。²²不料此舉引發洪武二十五年（1392）月魯帖木兒的叛亂。史載月魯帖木兒「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邛部並西番土軍萬餘人，殺官軍男婦二百餘口，掠屯牛，燒營屋，劫軍糧，率眾攻城（指建昌衛，今四川西昌）。指揮使安的以所部兵出戰，敗之，斬八十餘級，擒其黨十餘人。賊退屯阿宜河，轉攻蘇州（今四川冕寧）」。²³明廷派四川都指揮使瞿能（?-1400）和大將藍玉（?-1393）成功鎮壓這場叛亂，並在會理地區重建磚石結構的新城，²⁴興建永昌關、大隆關、老君關、

20 關於此點，參看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時期雲南方志的本文與情境〉，頁 102-107。

21 譚其驤，〈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收入氏著，《長水集》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 152。

22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下略作者），卷 311，〈四川土司一〉，頁 8021。

23 《明史》，卷 311，〈四川土司一〉，頁 8017。

24 《（同治）會理州志》，〈營建志·城池〉，卷 2，頁 197。包砌後的會理城牆，「高二丈三尺，周七里三分，計一千三百一十四丈，厚一丈二

甸沙關、密跡關、松坪關、七登堡、姜州堡等關隘，²⁵作為駐紮和防守的重要據點。此舉意味著明帝國在當地以軍事建置取代行政建置，並增設軍事機構，加派駐兵。於是在四川行都司所轄的涼山地區，漢人主導的衛所和彝人聚居的土司，共同構成邊疆社會的兩大管理體系。²⁶在衛所制度下，漢人官員主要集中在安寧河谷地區，負責鎮戍和維持當地秩序。相較於核心地區，明帝國在當地的行政控制力較弱。漢人官員來自全國各地，世襲武官由民屯、軍屯等方式遷入，掌握地方實權，²⁷文官多為貶謫至此，官卑職小，文化建設難以開展。衛所與土司之間既相對獨立，卻又相互影響，更時而發生矛盾和變亂。繼明初月魯帖木兒叛亂之後，嘉靖四十四年（1565）雲南土官鳳繼祖（?-1568）發動叛亂，波及四川會川衛及雲南武定府、尋甸府等地，²⁸至隆慶二年（1568）方才平定。此後變亂日愈頻繁，

尺，垛口一千五百一十四個，城鋪三十座，濠闊三丈，深八尺，廣一千三百二十二丈，門四，先惟北門建樓以司更鼓」。會理城整體佈局為「田」字形，南北走向。南北長約 1.77 公里，東西寬約 0.92 公里，總面積 1.628 平方公里。有所謂「四街、三關、二十三巷」。「四街」即北街、南街、東街、西街，「三關」即北關、東關和西關。以上「四街」、「三關」與「二十三巷」（即城內的 23 條巷道）共同構成棋盤式格局。參看楊麗華，《古城畫朝暉》（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頁 71-72。目前北城門和部分城牆仍然得以保存，「四街、三關、二十三巷」基本保存完好。

- 25 不著纂人，《（嘉慶）寧遠府志》，卷 11，〈關隘志〉（西安：古舊書店，1960 據原抄本油印，原書無頁碼）。
- 26 彭勇，〈衛所制度與邊疆社會：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員群體及其社會生活〉，《文史哲》2016 年第 6 期（濟南），頁 115。
- 27 筆者調查發現，城內現存的科甲巷，最早因龔姓人家居住於此，故名「龔家巷」。後胡姓、楊姓、吳姓等外姓大戶人家因民屯、軍屯等原因遷入，後世族人多有考中科舉在外做官者，故改名為「科甲巷」。（調查時間：2022 年 1 月 15 日至 1 月 25 日，調查地點：會理市。）
- 28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

明朝雖大量增兵防守，仍不能有效控制交通沿線，帝國在當地的統治趨於崩潰。²⁹

清朝入主中原並向西南地區進軍後，也面臨與明朝類似且更為複雜的困境，即作為異族的清朝統治者如何行使對當地的有效管轄，並塑造當地的文化認同。

從國家建設的角度來看，清朝入關後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確立自身作為中國王朝的正當性，也即「清朝是否等同於『中國』」的問題。作為從長城以北（「外」）進入中原（「內」）的非漢族群，滿人統治者如何讓中原地區的漢人、其他地區的非漢族群以及周邊王朝承認它建立的清朝也是「中國」的王朝？³⁰為此，清朝在政治上採取專制控制的同時，

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205，「景泰二年（1451）六月丁丑」條，頁 4399。

29 李宗放，〈明代四川建昌地區的行政和軍事建置及變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 年第 10 期（成都），頁 23-29。

30 作為「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歐立德反覆提醒「不宜在『大清國』和『中國』之間劃上一道過於分明的界限」。他認為至少應該搞清楚以下幾個問題：一、滿人是如何看待「大清國」的？二、「中國」對滿人來說意味著什麼？三、漢人是如何看待「大清」與「中國」的？四、周邊地區以及外部的人們又是如何認識的？筆者認為這一提示非常重要，絕不能用今天重新定義的「中國」觀念去觀察歷史。明末清初的漢人士大夫黃宗義、顧炎武等人提出「華夷之辨」、「亡天下」的命題，表明在他們看來滿人入主中原無異於外族入侵，與以往的改朝換代截然不同。順治年間，蒙古人稱滿洲為「紅纓蒙古」，即視滿洲為自身而非「中國」的一部分，即使滿人入關後仍是如此（儘管遭到順治帝的駁斥），可見在蒙古人心中，並非一開始就把「大清」視為「中國」。雍正帝編纂的《大義覺迷錄》一向被多數中國學者視為滿人非常像「中國人」的有力材料，但正如歐立德反問的那樣，假如滿人真的如此「中國人」，那麼雍正帝又何必殫精竭慮寫作出版這樣一部書來證明呢？參看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北京），頁 86-93；歐立德著，黃雨倫譯，〈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

於文化方面採取相對寬容的態度，制度上則表現出靈活性，並將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為維繫王朝統治，清政府試圖重建儒學正統，以文化而非種族作為王朝統治的正當性基礎。³¹康雍乾三朝從制度和文化上大規模地開啟「大一統」國家建設的步伐，在地處「華夏邊緣」的會理地區，恢復科舉制度、鼓勵創辦書院，正是清廷努力構建「大一統」歷史觀的重要舉措。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發佈創建省城書院的上諭。位於四川成都的錦江書院，即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乾隆元年（1736）上諭稱：「書院之制，所以導進人才，廣學校所不及」，「書院即古侯國之學也。」³²大力提倡書院的發展與建設。³³會理地區經過前期的改土歸流與設州置縣，行政制度逐漸由軍政向民政轉變，這為文化上推行「大一統」歷史觀奠定軍事和政治基礎。

乾隆十八年，知州蔣文祚在任時，書院初具規模，改稱「玉墟書院」。嘉道年間，劉逢祿（1776-1829）在發揚《春秋公羊傳》「三統」、「三世」說時，按照「春秋大一統」的觀念重新詮釋「內外」的含義，在承認清朝政治正當性的前提下，以禮儀定義「中國」的概念，符合禮儀者即為中國，不符合者即為蠻夷。³⁴質言之，華夏邊緣的族群意識，乃以禮儀文化而非族群疆域為依據來劃分「內」、「外」。嘉慶、道光之際

法與概念考古》，《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上海），頁51-53。

31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上卷第一部，〈理與物〉，頁387。

32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頁436。

33 據學者統計，四川一省在清代新建書院383所，其中1733年後新建363所，佔全部新建書院的95%。朱漢民、鄧洪波、高峰煜，《長江流域的書院》（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154。

34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頁573-579。

正是四川興辦義學的高峰期，³⁵此時金江書院的發展亦趨於興盛。〈新建金江書院碑記〉記載：

刺史劉公蒞任茲土，甫下車，即問士習民風，書院何地，山長何人。公以楚陂世家，自辛酉冠於鄉，壬戌聯捷，海內推名，解元名進士。僉不敢欺，以田地、租息存印簿者實對。公知積廢之不可以驟興也，於是朔望親試內外庠，嚴切批改，周而復始。既勤民，復愛士，其心苦矣，然猶未肯以此滿意也。適遇會民莫朝璽等與滇民潘小創為債帳構訟，願作功德培補書院。公命張學博與余、姚二齋長董治其事，辦理妥協。資斧有出，延請同年進士萬松筠先生掌教。又以舊址狹隘，命蘇孝廉另擇爽塏，遷而大之。越數月，落成，更名曰「金江書院」，並作碑文〔案：原文誤為「父」〕，以示規模煥然一新。³⁶

當地官僚士人筆下完全看不到任何夷夏之別，彷彿在經歷多年的禮樂教化之後，此地已「煥然一新」，成為施行禮樂教化的「王化樂土」。〈新建金江書院碑記〉、〈新建金江書院記〉都強調書院乃「造士之地」，及培育儒學禮儀文化的重要性。碑記更將會理自明初以來的五百餘年歷史敘述為「未遭兵燹」、「文武衣冠極為繁盛」，³⁷與歷史實際相去甚遠。當地官僚士人所宣稱和記錄的歷史，實際上是在傳達一種文化理念與認同：即淡化夷夏之別，甚至「以夏變夷」，用帶有官方宣教

35 蒙默、劉琳、唐光沛、胡昭曦、柯建中，《四川古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頁 523。

36 《（同治）會理州志》，卷 11，〈藝文志上·新建金江書院碑記〉，頁 1196-1198。

37 《（同治）會理州志》，卷 11，〈藝文志上·新建金江書院記〉，頁 1199。

性質的文本敘述改寫和重塑了當地歷史。無論時移勢遷，最為核心且不變的是保持對禮儀文化的認同。在方志書寫者筆下，不僅夷夏之防為禮儀文化所淡化，而且還透過重塑歷史記憶，強化對華夏禮儀的認同。³⁸

在有別於傳統中原漢地的西南地區，書院建設鞏固軍事征服與制度建制，軍事控制與行政建置又為文教功能奠定基礎，「文」、「武」得以合一，³⁹金江書院成為聯結地方勢力與中央朝廷之間的環節。經過此番建設，方志纂修者聲稱，當地的文

38 這種以禮儀文化而非單純以族群為認同標準的理念，與「新清史」認為清廷堅持「滿洲之道」的論述相異。「新清史」要求重新評估非漢族群在歷史上的貢獻，重視「族群意識」與「我族認同」，批評「漢化」議題。見 Evelyn S. Rawski,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 4 (1996, Cambridge), p. 842;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5-27. 筆者認為此一觀點頗具啟發性，但清朝入主中原後，統治策略已然發生改變。僅靠「滿洲之道」，顯然難以有效統治和整合內部族群、文化多元的遼闊帝國。筆者認為「新清史」忽略了南方地區在帝國中的角色。「新清史」認為清帝國具有內亞屬性，但疆域廣袤的清帝國又何嘗不具有「南方屬性」？另，柯嬌燕 (Pamela K. Crossley) 對「族群」觀念有著特定的理解。她認為滿人身份經歷了「文化—血親—族群」的過程，直到 19 世紀中葉滿人才產生了「族群意識」。歐立德所用的「族群」一詞概念更為寬泛，即用以說明滿人身份是在歷史中構建出來的。羅友枝 (Evelyn S. Rawski) 和路康樂 (Edward J. M. Rhoads) 對「族群」的認識亦不盡一致。儘管概念的使用略有差別，但他們的觀察與分析均有助於從「身份認同」的角度，重新理解和定義「何為『中國人』」、「何為『滿洲人』」這樣的議題。參看張瑞威，〈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歷史人類學學刊》第 4 卷第 1 期 (2006 年 4 月，香港)，頁 93-112。

39 關於這一方面的敘述，可以參看 Joanna Waley-Cohen,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6), pp. 3-5.

化面貌已然改變：「士習漸端，民風近樸，農耕而女不織，工拙而商倍勞。飲食衣服，去奢而崇儉；冠婚喪祭，多質而寡文。至於夷俗厥分，兩種西番，性尚馴良，風俗頗近華夏。」⁴⁰這固然是方志書寫的慣常表達模式，卻也體現出纂修者的期待，即將西南一隅納入清廷標準化（也可以稱之為「內地化」）的國家建設體系之中。

三、社會動亂：重塑政治與文化的歷史記憶

儘管在中國歷代王朝中，清朝對邊疆的治理取得空前的成功，也採取更為靈活的制度和方式處理族群關係，但清廷對待邊疆族群「從俗」的態度，實建立在強大的軍事征服與嚴密的政治控制之上。會理地區地處「華夏邊緣」，長期以來「夷」、「夏」混雜，彼此衝突在所難免。雍正朝大規模改土歸流後，清廷准許和鼓勵漢人大量移民到雲貴等地區。這一移民政策雖然有效推動當地的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卻在清末引發漢人與苗民、回民之間大規模的族群衝突，對當地的書院建設與文化認同造成巨大衝擊。⁴¹

咸豐六年（1856），雲南回民發動叛亂，前後達數十年之久（1856-1873）。咸豐十年（1860），雲南回民攻佔會理地區，自道光元年（1821）劉德銓蒞任知州後，建制已頗具規模的金江書院在叛亂中被毀，回民武裝勢力佔據會理城長達十個

40 《（嘉慶）寧遠府志》，卷18，〈風俗志〉。

41 遺憾的是，筆者並未找到有關其他非漢族群與金江書院關聯的史料。由於本文以金江書院為關注主軸，若擴大討論範圍，則可能偏離本文題旨；若不予說明，又有不夠完備之嫌。故只選取回民叛亂一事予以描述，並特作說明，敬請讀者留意。

月，直到次年清廷才重新控制這一地區。⁴²這場帶有宗教色彩的叛亂雖然最終得以平息，⁴³但雲南回民攻佔會理地區及書院被毀等事實，無疑使當地土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同時也為他們重塑政治與文化的歷史記憶提供契機。

戰亂之後，會理當地回民數量急劇減少。雍正朝改衛為州後曾清查當地戶口。統計結果為漢戶 2,536 戶，10,909 丁；夷民 3,364 戶，12,500 丁，⁴⁴漢民與夷民在人數上平分秋色。此後隨著漢人移民進入與商品經濟發展，嘉慶朝以後漢民「新戶增至八九千家。或梯山以作田，或濱河而謀產，墾地焚林，其利十倍，好煙種蔗，其利百倍」，出現「夷地招佃，漢民開墾，遂致漢夷雜處，疆界混淆」的局面。⁴⁵會理成為西南地區商幫發達的重要交通和防禦據點。外來移民不僅促進商業城鎮的形成，⁴⁶也在當地修建景莊王廟（江西）、文公祠（江西吉州）、觀音

42 這場發生在 19 世紀中葉的社會動亂，在官方史籍中多用「咸同回亂」代之，將發動叛亂的人群稱之為「匪」，中國學界通常稱呼此事件為「回民起義」，歐美學者則稱為「回民叛亂」或「班賽（Panthay）叛亂」。本文使用「回民叛亂」一詞。參看白壽彝，《回民起義》（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Changkuan Lin, “Chinese muslims of Yunnan,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revolt 1855-187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91).

43 李松茂，〈伊斯蘭教和回民起義〉，《西北民族大學學報》1982 年第 1 期（蘭州），頁 18-25。

44 《（同治）會理州志》，卷 9，〈賦役志·戶口〉，頁 907-908。

45 常明，〈題四川迷易等處改土歸流疏〉，《（同治）會理州志》，卷 9，〈賦役志·戶口〉，頁 912。類似的土地糾紛在此前曾多次出現，參看常明，〈籌定編查漢民私佃夷地章程〉，收入《清實錄》第 31 冊，《仁宗睿皇帝實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嘉慶十七年（1812）九月，頁 545。

46 徐銘，〈清代涼山彝族地區的商業〉，《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7 年第 2 期（成都），頁 61-66。

閣（雲南大理）等移民會館。⁴⁷部分回民商人在這樣的背景下從雲南遷徙而來。清廷鼓勵漢人移民的政策，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同時，亦加劇漢人與回民之間的矛盾，最終演變為大規模叛亂。⁴⁸

叛亂發生前的嘉道年間，會理「回人棲居城內西北隅，約數百家。合鄉間散居者，約數千人。咸豐十年冬，潛通滇回，州城遂陷。經克復後，剿滅殆盡，唯治西北隅所存數十家」。⁴⁹清廷還發佈禁令，不准回民進入縣城。會理附近的鹽源地區，清軍甚至提出「不問匪不匪，只問回不回」的命令，並在城外立下「回匪入境，格殺勿論」的石碑。⁵⁰面對血腥的屠殺，當地回民或命喪於此，或逃亡他鄉。亂平之後，當地回民人口僅餘原先的 10%，有些倖存者甚至被迫改名換姓，並改變宗教信仰和生活習俗。⁵¹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構成當地在亂後重塑文

47 藍勇，〈清代西南移民會館名實與職能研究〉，《中國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北京），頁 16-26。

48 關於咸同年間雲南回亂，《劍橋中國晚清史》認為它是「19 世紀 40 年代突然爆發的血腥的村社世仇的擴大」，「具有種族世仇的背景」。此外，土地和貿易方面的爭奪也是引發漢回衝突的重要誘因。參看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1-214.

49 邊政設計委員會編，《川康邊政資料輯要二十九種·會理》，收入馬大正主編，《民國邊政史料彙編》第 26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據民國二十九年〔1940〕邊政設計委員會鉛印本影印），頁 442。

50 蘇德宣，〈川西寧屬各縣回民記實〉，《突岬》第 5 卷第 1 期（1938 年 9 月，重慶），頁 7-10。

51 回民內部的宗教壓迫以及長期的漢回雜處，也是促使回民演變為漢民的重要因素。參看楊思久，〈涼山地區回族源流考〉，《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3 年第 2 期（成都），頁 25。至民國時期政府進行邊地調查時，當地回民僅有數十家而已。參看邊政設計委員會編，《川康邊政資料輯要二十九種·會理》，頁 397。

化認同的重要前提。

其次，叛亂引起當地士人的反思。知州鄧仁垣〈重修會理州志序〉提及咸豐十年的叛亂對城池建築以及文物典籍造成的破壞：「予竊訝之，第恐世遠年湮，往蹟剝蝕，轉成疑殆之闕。」⁵²正是在此背景下，當地士人一方面配合清廷從武力上加強防禦，穩定局勢（典型的做法即組織鄉勇團練對抗回民軍隊）；另一方面從文化和心理出發，改造當地民眾的華夏觀念與文化認同。叛亂平息後，知州王燕瓊「改書院為學署，遷書院於此，亦黜邪崇正之微意。舊有院門一座，講堂三楹，南北書房各五間，北首書房一院共八間，照牆一座，加以修葺，煥然一新」。⁵³「遷書院於此」的「此」指的是此前位於城中的清真寺，恰是亂前回民在城中的聚居地以及宗教活動場所。同年，金江書院新修大門，約請文人李成章撰寫楹聯：「河嶽英靈鐘此輩，國家元氣在斯文。」回亂發生的重要誘因之一，即是回民保持與眾不同的特殊宗教習慣與習俗，叛亂更加劇清廷官員與地方士人對以清真寺為中心之回民社會的恐懼。⁵⁴知州王燕瓊將清真寺斥為「淫祠」而改為書院，以及文人李成章為書院撰寫楹聯的舉動，不僅意圖破壞回民的社會結構，更賦予金江書院在地區發展史上的新義和價值——它將漢人集體受難的經驗，轉化為凝聚族群和文化認同的工具。這些集體記憶由地方菁英提供，被刻畫在方志中流傳，力圖改造當地的族群與文化認同。

《（同治）會理州志·人物志》專列「忠義」一門，特意

52 鄧仁垣，〈重修會理州志序〉，《（同治）會理州志》，卷首，頁29。

53 《（同治）會理州志》，卷2，〈營建志·書院〉，頁217。

54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p. 212.

表彰了參與平息回亂的兵丁，將他們的名字一一記錄在冊。其中有「咸豐十一年剿辦滇匪陣亡兵丁」名單 14 人，以及「咸豐十年、十一年剿辦滇匪陣亡傷亡鄉勇團練，白塔山陣亡鄉勇、練勇」計 147 人。⁵⁵鄧仁垣在重修的方志序言中特別提及，這些「忠孝節烈者」的事蹟，若不「及早圖修」，則「前徽亦沒，後美弗彰」，⁵⁶流露出利用方志書寫強化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心理。《（同治）會理州志》付梓後，雕版即藏於金江書院。⁵⁷方志纂修與書院建設相輔相成，成為當地在亂後重塑政治與文化之歷史記憶的兩大手段。李成章楹聯所謂「國家元氣在斯文」，則將「禮師尊儒」的文化觀念映射其中。金江書院的學訓，以《論語》所載之「三畏」、「四箴」為訓。無論從書院正門的楹聯還是從學訓的思想主旨來看，都完全符合儒家教育的理念。地方州志的書寫與金江書院的學規院訓，不僅將濃厚的政治綱常與觀念秩序融入其中，⁵⁸更欲借此作為強化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工具。此時「夷」與「夏」的分野雖然針對的是不同族群之間發生矛盾、乃至引發動亂的現實狀況，但在書院復建與方志書寫的過程中，卻表現為一種高度的華夏文化認同。當地對漢地儒家文化內涵的繼承、強調與發展，在方志中清晰可見。⁵⁹相較之下，不同族群間的矛盾以及由此引發的回民

55 《（同治）會理州志》，卷 6，〈人物志·忠義〉，頁 550-554。

56 鄧仁垣，〈重修會理州志序〉，《（同治）會理州志》，卷首，頁 30。

57 Joseph R. Dennis 在討論晚期中華帝國的方志編纂時，指出方志刻本的複本有可能送至縣學、書院等處。這種對方志生產、流通、閱讀與使用的社會脈絡的考察，有助於理解方志書寫與地方菁英之間的關係。參看 Joseph R. Dennis,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51-285.

58 朱漢民、鄧洪波、高峰煜，《長江流域的書院》，頁 7-8。

59 王明珂指出：「在一個社會中常蘊含著許多互相矛盾的、競爭的多元社

叛亂，其歷史記憶卻被大大弱化，直至「失憶」。⁶⁰

一般認為，雲南回民的叛亂因太平天國運動的影響而爆發，⁶¹後者對滿人統治正當性的質疑，以明確的族群關係和拜上帝教的普遍主義（人人平等）為理論依據。⁶²也即，這兩大事件

會記憶，它們透過不同的管道相互誇耀、辯駁與模仿、附和，各社會人群藉此凝聚其群體認同，並與其他群體相區分、抗衡。……在社會權力運作與抗衡下某些優勢社會人群的記憶得到強化、保存，另一些人群的記憶則被失憶或廢棄。」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北京），頁140注釋1。筆者可以補充的是，清廷和當地官僚士人作為掌握社會權力與資源的群體，能夠將他們的集體記憶記錄下來，並以此重建和鞏固其社會地位，並不斷塑造著華夏文化的認同。

60 《劍橋中國晚清史》認為清末西北、西南地區的回亂非常難於研究，原因是有關回民方面的可靠文獻太少。有關回民對這一事件的記憶，參看 Jacqueline Armijo-Hussein, "Narratives Engendering Survival: How the Muslims of Southwest China Remember the Massacre 1873," in *"Race" Panic and the Memory of Migration*, eds. Meaghan Morris and Brett de Ba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Banbury: Drake distributor, 2001), pp. 293-322。目前當地雖有回民居住生活，但大多為經商（多經營販賣清真牛肉）從雲南遷徙而來。當地現無清真寺遺存，可見清廷所做的努力確實收到一定成效。但卻存有兩座天主教堂，其中一座位於元天街，名曰「聖母堂」（另一座位於西關，名曰「福音堂」），於民國十五年（1926）由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賈元禎（Paul Audren）神父籌資創建，曾擁有教堂、鐘樓、修道院、聖愛醫院等建築。修道院、聖愛醫院已於1990年代拆除，教堂仍歸天主教會使用。現存教堂為中西合璧風格，主樓正面為法國羅曼式磚木結構，三個山字形尖頂，半圓形拱券，後方鐘樓為傳統中式重簷六角攢尖頂木結構。會理城周邊還有眾多佛教寺院，且香火興盛。（調查時間：2022年1月15日至1月25日，調查地點：會理市。）不同宗教信仰融匯於一地，命運卻迥然有別。此現象背後的深層原由，亦是值得玩味的話題。

61 馬汝珩，〈太平天國時期雲南回族人民的反清運動〉，《內蒙古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呼和浩特），頁36-38。

62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頁743。

嚴重衝擊清朝苦心經營、建立的「大一統」觀念。以往處於相對關係中的「內、外」與「夷、夏」等觀念，在新的歷史語境中再次被明確化，並快速升級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經久不息。兩場大規模的社會動亂不僅在政治和軍事上部分瓦解了清朝的國家治理體系，還在文化和觀念上對清朝的意識形態造成了極大的衝擊。⁶³

同治九年（1870）春，知州鄧仁垣蒞任。此時「政立民孚，乃咨廢墜。次第修舉，因念書院為造士之地，垣宇未周，堂舍未備，亦闕典也。公以楚南名士，精堪輿之術，考課之暇，周覽書院形勢，謂乾巽方宜建樓閣，以催文運」。於是興修書院，並詳細描述書院的各處建築，如書畫舫、絳雲亭等。方志總結道：「自此，蘭桂芬芳，竹木陰翳，肄業者鵲起蟬聯，蒸蒸日上，雖鹿洞、鵝湖之盛，不多讓焉。」⁶⁴方志書寫者對書院幽雅環境的具體描述應毋庸置疑，但將金江書院媲美聞名天下的白鹿洞書院、鵝湖書院，則不能不說是出於書寫者內心的想像與期待。書寫者作此類比的心理，當是處於回亂平息後的政治社會情境之中，哀歎儒家禮儀制度盡廢，而興修後的書院「滿院幽香」、「爽氣撲人」，竟在遠離王化的邊遠之地得以重建儒學正統，因而有了「斯文所寄」的感慨。

書院作為宋代以來地方士人闡揚儒家學問和道德理想的場所，在清廷統治的西南地區發揮有別於傳統漢地的特殊作用。它既是推行「大一統」歷史觀的有效工具，又是用於撫慰邊地族群矛盾的一種手段。清廷對西南地區的開拓與建設，本質上

63 《劍橋中國晚清史》指出雲南的叛亂決不能單純看做是回民之亂，而是中國最西南省份社會秩序的總崩潰。見 John K. 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p. 212.

64 《（同治）會理州志》，卷2，〈營建志·書院〉，頁217-220。

是中華帝國控制邊疆地區傳統的延續，依託於軍事征伐、行政建置的書院建設，有助於清廷意識形態的延伸與控制。金江書院的地位和價值正是在此過程中凸顯，它的其他功能亦為此政治目的所遮蔽。咸豐年間的回亂，使得書院作為統治手段的用途被再度「發現」和放大，從而為重塑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提供難得的歷史條件。亂後當地回民人口大為減少，供回民禮拜的清真寺也改建為書院，這一切都使重新淡化夷夏之防、增強華夏文化認同成為可能。⁶⁵知州王燕瓊改清真寺為書院，文人李成章為書院撰寫楹聯，以及知州鄧仁垣興修書院的種種舉措，雖然針對的是亂後的現實情景，但他們努力弱化「夷」、「夏」之間的對立，力圖重塑當地的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修復和回歸清朝「大一統」的歷史觀。既以「武」的行動使當地回歸朝廷勢力的管轄，又利用立忠義傳、設學規學訓等「文」的手段進行引導，國家權力與地方社會互動、競合，在潛移默化中達到國家權力持續深入、「治教合一」的目的。在此進程中，金江書院扮演聯結地方與朝廷、推動邊疆「內地化」的關鍵角色。同光年間的金江書院，因歷史環境的變化，在構建歷

65 黃麗生對比清代臺灣與內蒙古書院指出，作為「邊外」，內蒙古的書院長期處於抑制之中，直到同治時期才開始突破「承德書院群」的範圍，孤立且分散地出現在奉天昌圖府以及歸化城廳和薩拉齊廳。歸化、綏遠方面書院的興建，則是因同治年間捻亂、回變兵事的發生，當地希望修講文德、改善民風，故有此舉。參看黃麗生，〈清代邊疆儒學的發展與特質〉，頁 119-122。內蒙古與四川南部書院都具有因地方社會動亂而欲修文教、建書院的相似經歷，然結果卻不盡一致。內蒙古歸化、綏遠等地自漢人耕墾三百年來才有第一座書院，而會理在回亂之前已有較長的書院建設經驗，根基迥異，不可同日而語。且會理地區漢人在社會中佔據主導地位，較能充分整合地方資源，因而當地的「漢化」程度要超過內蒙古等「邊外」地區。在筆者看來，會理書院的發展與特質，更近於臺灣而非內蒙古。

史記憶與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再度粉墨登場，和當時的清廷一樣迎來它的「中興」時期。

正當書院建設、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開始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新組合構建之際，金江書院的歷史卻隨著清朝的敗落而走向終結。光緒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廷正式下令，要求各地將書院改為學堂。時任知州胡雨餘將金江書院之產業及舊址，改制成立會理州中區高等小學堂。光緒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正式下令廢除科舉，書院徹底失去賴以生存的基礎，從而紛紛改制或停辦，金江書院的歷史也遂告終結。

結 語

在清朝的國家建設體系中，滿洲、蒙古、新疆、青藏與西南同在中原腹地的周圍。然入關後，滿洲作為「龍興之地」而成為封禁地域，蒙古、新疆、青藏變為清帝國的邊地藩屬，長期扮演族群政治同盟的角色。與同屬「邊疆」的其他「藩部」不同的是，儘管會理地區夷人聚居，歷代王朝長期以來無法有效管轄，但它「漢蠻雜處」，形成「華夏邊緣」的特殊區位，在可能激化族群矛盾的同時，也促進當地族群的融合，消弭族群之間的「夷」、「夏」分野。特別是清末咸豐年間回亂的發生，使得當地回民人口大量減少，且隱姓埋名融入漢人社會之中，更為邊疆的「內地化」提供歷史契機。⁶⁶加之清廷及當地士

66 此種「內地化」的趨勢在其他「藩部」地區也有所體現，「漢化」的行政管理體制亦曾部分應用於蒙古、新疆等地，但各地的「漢化」行政體制卻呈現出不同效果。此外，清廷在會理地區推行的「內地化」政策，與它在同屬西南地區的嘉絨地域社會所推行的政策高度相似，這意味著我們還要對清朝的政體與國家特質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參看曾現江，

人透過大規模的書院建設與方志纂修，最終推動當地文化面貌的變化。⁶⁷儘管此時清廷已經處於風雨飄搖的末世，但華夏文化卻在上述種種因素綜合作用下，在當地站穩腳跟。在清末民初頻繁爆發族群衝突的涼山地區，會理反而成為一個較為傳統和穩固的、充滿著漢文化的城市。⁶⁸同屬「邊疆」，清廷的戰略考

《清中葉至民國嘉絨地方：社會、文化與族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67 同處西南「邊疆」，會理與湘西的情形又有所不同。如康豹（Paul R. Katz）等人所揭示，湘西雖然地處中華帝國腹地，但直到民國時期仍然保持著相當強的「邊疆」性格。謝曉輝認為，這種「邊疆」性格的存續與否及其強弱，不僅與地理生態以及中原王朝對西南邊疆的定位有關，更與不同主體對「邊緣性」的經營密切相關。參看謝曉輝，《製造邊緣性：10-19 世紀的湘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頁 221-228。就會理地區而言，它在地理條件上適於農業耕種，且秦朝時即已設郡縣（儘管行政設置時有反覆，但中原的統治制度在當地畢竟有過根基，這與湘西直到清朝才系統設立州縣的情形不同），此後清朝又通過書院建設與方志纂修等手段，在當地建立王朝國家的直接統治秩序。種種細微因素的差別，造就了兩地「邊疆」性格的差異。
- 68 許多研究已經指出，人們對不同時期特定地區「漢化」的描述，多會受到現實情境的影響。筆者亦不否認在《會理州志》等方志文本存在模式化的敘述，但此種模式化敘述與客觀事實之間的契合程度，在不同區域也存在差異。就會理而言，它的「邊疆」性格不斷萎縮，而「內地化」趨勢愈來愈強，方志文本與現實情境之間的差別也逐步縮小。中日戰爭時期，著名化學家、教育家曾昭掄（1899-1967）曾率隊徒步考察涼山夷（即今日所稱之「彝」）區。一行人從昆明出發，途經會理。曾昭掄在考察行記描述「會理是一座典型的四川縣城。」參看曾昭掄，《滇康道上》（桂林：文友書店，1943），頁 120。當他抵達西昌後，卻專門記述了西昌當地的「夷人」：「摩登人物中間，常會看見仍做原始裝束，赤腳披氈的高大裸夷男女。」參看曾昭掄，《大涼山夷區考察記》（昆明：求真出版社，1945），頁 35。此外今日西昌尚有十餘座清真寺，與會理的情況完全不同。以上觀察一方面可說明經過清朝大規模的書院建設和方志纂修之後，會理的文化面貌已與傳統的四川內陸地區別無二致；另一方面也展現出同一區域的「邊疆」之內，「內地化」程度也會有細微差異。以地理位置而言，西昌更接近夷區，地處多元文化匯集的

量卻迥然有別。金江書院歷史之升沉起伏，恰可作為觀察清朝國家建設與特質轉變的一個重要個案。

* 感謝中山大學楊勇教授、四川師範大學李鑫先生對本文寫作給予的指導和幫助。承蒙匿名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與修改建議，筆者方能據以修訂內文並改為今題，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林 佳 校對：王 威）

藏彝走廊，且是區域的政治經濟中心——它既是靈關道南部涼山段的中心、四川境內最後一個交通樞紐，也是靈關道與岷江道的交匯之處。這樣的區位條件使得它更有可能保存異質的文化因素，清末的雲南回亂亦未波及到西昌本地，因而當地對回民的態度也有所差別。民國年間建立西康省，即是在「內邊疆」建省的一個重要舉措。此舉上承清朝在西南地區的國家建設，後啟 1949 年後共產黨進入並控制西藏的歷史。放在長時段的歷史脈絡中，更可看出此處「內地化」的歷史過程及其意義。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 《清實錄》第 31 冊，《仁宗睿皇帝實錄（四）》。北京：中華書局，1986。
- 不著纂人，《（嘉慶）寧遠府志》。西安：古舊書店，1960 據原抄本油印。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編著，《成都考古發現（2017）》。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
- 李勇主編，《四川省會理第一中學校志（1751-2010）》。涼山：四川省會理第一中學編印，2011。
- 和坤等纂，穆彰阿等修，《嘉慶重修一統志》。北京：中華書局，1986 據 1936 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重印。
- 思成修，劉德銓纂，《（道光）夔州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四川府縣志輯》第 50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 據道光七年（1827）刻本影印。
- 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涼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館等編，《安寧河流域古文化調查與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
- 會理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會理縣志》。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
- 楊昶等修，王繼曾等纂，《四川省會理州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76 據同治九年（1871）刊本影印。

二、近人著作

- 方行、經君健、魏金玉主編，《中國經濟通史·清代經濟卷》。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2000。

-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北京，頁136-147、191。
- 王明珂，〈王崧的方志世界——明清時期雲南方志的本文與情境〉，收入孫江主編，《新史學（第二卷）：概念·文本·方法》，頁97-118。北京：中華書局，2008。
-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增訂本）》，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 白壽彝，《回民起義》，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
- 朱漢民、鄧洪波、高峰煜，《長江流域的書院》。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 李宗放，〈明代四川建昌地區的行政和軍事建置及變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6年第10期，成都，頁23-29。
- 李松茂，〈伊斯蘭教和回民起義〉，《西北民族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蘭州，頁18-25。
- 李鴻賓，〈唐朝北部疆域的變遷——兼論疆域問題的本質與屬性〉，《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4卷第2期，2014年6月，北京，頁63-76、180。
- 李鴻賓，〈有關唐朝疆域問題的若干思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44卷第1期，2017年1月，北京，頁99-106。
- 汪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 肖永明、劉豔偉，〈新中國成立以來書院研究的梳理與反思〉，《大學教育科學》2020年第3期，長沙，頁88-95。
- 唐翔，〈會理城河流域的古代文化遺存〉，《四川文物》1992年第4期，成都，頁14-18。
- 徐銘，〈清代涼山彝族地區的商業〉，《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成都，頁61-66。
- 馬汝珩，〈太平天國時期雲南回族人民的反清運動〉，《內蒙古師院學報》1981年第1期，呼和浩特，頁36-50。
- 張瑞威，〈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評述〉，《歷史人類學學刊》第4卷第1期，2006年4月，香港，頁93-112。
- 張繼瑩，〈政治情境與地方史書寫——以清代大同方志為例〉，《清華學

- 報》第 50 卷第 2 期，2020 年 6 月，新竹，頁 275-311。
- 彭 勇，〈衛所制度與邊疆社會：明代四川行都司的官員群體及其社會生活〉，《文史哲》2016 年第 6 期，濟南，頁 99-115、164。
- 曾 偉，〈明清易代之際的方志編纂與地方社會——以渾源州為例〉，《中國地方志》2018 年第 2 期，北京，頁 44-55、125。
- 曾昭掄，《滇康道上》。桂林：文友書店，1943。
- 曾昭掄，《大涼山夷區考察記》。昆明：求真出版社，1945。
- 曾現江，《清中葉至民國嘉絨地方：社會、文化與族群》。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黃麗生，〈清代邊區儒學的發展與特質：臺灣書院與內蒙古書院的比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34 期，2005 年 12 月，臺北，頁 97-136。
- 楊思久，〈涼山地區回族源流考〉，《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3 年第 2 期，成都，頁 22-25、33。
- 楊麗華，《古城盡朝暉》。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8。
- 蒙 默、劉琳、唐光沛、胡昭曦、柯建中，《四川古代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 鄧洪波，《中國書院史》。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6。
- 謝曉輝，《製造邊緣性：10-19 世紀的湘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
- 藍 勇，〈清代西南移民會館名實與職能研究〉，《中國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北京，頁 16-26。
- 譚其驤，〈釋明代都司衛所制度〉，收入氏著，《長水集》上冊，頁 150-15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邊政設計委員會編，《川康邊政資料輯要二十九種·會理》，收入馬大正主編，《民國邊政史料彙編》第 26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據民國二十九年（1940）邊政設計委員會鉛印本影印。
- 蘇德宣，〈川西寧屬各縣回民記實〉，《突崛》第 5 卷第 1 期，1938 年 9 月，重慶，頁 7-10。
- 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 年第 4 期，北京，頁 86-93。
- 歐立德著，黃雨倫譯，〈當我們談「帝國」時，我們談些什麼——話語、方

法與概念考古》，《探索與爭鳴》2018年第6期，上海，頁49-57、142。

Armijo-Hussein, Jacqueline. "Narratives Engendering Survival: How the Muslims of Southwest China Remember the Massacre 1873." In *"Race" Panic and the Memory of Migration*, edited by Meaghan Morris and Brett de Bary, pp. 293-322.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Banbury: Drake distributor, 2001.

Curzon, George. *Frontie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8.

Dennis, Joseph R. *Writing, Publishing and Reading: Local Gazetteers in Imperial China, 1100-1700*.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Elliott, Mark C.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Fairbank, John K. and Kwang-Ching Liu,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1, *Late Ch'ing, 1800-1911*, part. 2.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Kratochwil, Friedrich. "Of Systems, Boundaries, and Territoriality: An Inquiry in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tate System." *World Politics* 39, no. 1 (1986, Cambridge), pp. 27-52.

Kristof, L. K. D. "The Nature of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49, no. 3 (1959, Philadelphia), pp. 269-282.

Lamb, Alastair. *The China-India Border: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d Bounda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in, Changkuan. "Chinese muslims of Yunnan, Southwest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revolt 1855-1873."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berdeen, 1991.

Rawski, Evelyn S. "Presidential Address: 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 no. 4 (1996, Cambridge), pp. 829-850.

Waley-Cohen, Joanna. *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 Empire and the Military under the Qing Dynasty*.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Publishers, 2006.

三、網路資源

「『邊疆：流動的歷史空間』會議綜述」，清華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微信公眾號，2022年1月19日，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aKnhINha5MMnH4l-zxqIXg>（檢索日期：2022年1月25日）。

From Frontier to Inland: A Case Study of the Jinjiang Academy's Construction in the Huili Are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Zheng, Hao*

Abstract

Huili is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Sichuan, on “the edge of Hua Xia”. The Qing dynasty bureaucratic gentry did not only participat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cademic academies, presiding over their education and economy, they also used gazetteers to strengthen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This shaped the local “Yi-Xia” concept and cultural identity. Social turmoils in the Xianfeng Period prompted local elites to transform the experience of the collective suffering of the Han people into a tool for a cohesive ethnic identity. These collective memories were written in the local gazetteers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maintaining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and constructing the “Great Unification” view of history through preaching by the local gentry. Aft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Huili was returned to officials sent by the Qing, academies had been constructed, and gazetteers restored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Huili was finally considered as “inland”.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JinJiang Academy's history can be used as an important case to observ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ing's state building.

* PhD candidate 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zhenghao93@163.com.

Keywords: Huili in Qing Dynasty, JinJiang Academy, the edge of Hua Xia, inland-changing, the writing of local gazetteers, historical view of “Great Unification”.